

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的 财政职能与政策实施

刘 昊¹ 崔春晓² 陈 工³

(1.温州商学院,浙江 325035;2.上海大学,上海 200444;3.厦门大学,福建 361005)

内容提要:财政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性支撑和保障。现代化新征程上,财政必须发挥好稳定经济、应对重要公共风险、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石作用。促进经济复苏、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实现共同富裕是财政政策的三大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职能的有效发挥和政策目标的成功实现依赖于构建更加完善的现代财政政策体系和全面提升财政政策实施效能。完善现代财政政策体系至少应包括优化和建立更加公平高效的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债务融资政策和财政调控政策。全面提升财政政策实施效能,要强化法治化和市场化原则的遵循和应用,加强财政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注重国内财政政策与全球重要经济体财政政策相协调。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新征程 财政职能 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544(2023)07-0054-08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发展环境还存在较多的复杂不确定性因素。“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1]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风起云涌,世纪疫情影响深远,大国博弈、文明冲突、军事战争和全球经济衰退,正在全方位重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环

境,党和政府在经济发展、国防外交、社会治理等方面面临着严峻考验。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全面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财政职能及其政策实施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目标。^[2]新时期新征程上,财政必须勇于担当,积极应对复杂矛盾和重大挑战,发挥好稳定经济发展、化解重要公共风险,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石作用,全力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

[收稿日期]2023-04-07

[作者简介]刘昊,教授,研究方向为财政金融管理;崔春晓,悉尼工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财政金融理论;陈工,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财税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财政纪律与市场约束’双机制构建研究”(22BGL056)。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新征程面临的挑战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进步的显著标志,是近代各国人民孜孜奋斗的共同目标,是人类社会向更高层次形态迈进的基本方向。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必须立足于中国独特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必须要清晰地认识到战略的伟大性和任务的艰巨性。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具有共性的特征,体现为高度工业化和人的现代化。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人口资源、发展基础与意识形态差异,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又各具特色。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和形成的现代化,是由物质基础十分落后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现代化,是悠久文明走向伟大复兴的现代化,是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体现了人民至上的先进发展理念。

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上的本质要求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理念的发展,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发展,是全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发展。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是否成功达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对于拥有 14 亿人口、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阶层利益诉求多样的大国

而言,实现共同富裕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待破解的重大课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建立在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要摒弃短期思维,建立长期视野,现代化进程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要将现代化任务和现代化成果在代际间公平配置。

(二)现代化新征程面临的重大挑战

百年未有大变局下,全面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的主要外部挑战是逆全球化潮流,尤其是来自全球科技、经济和军事力量霸主美国的“规锁”。^[3]我国一贯奉行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并积极履行大国责任。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科技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作为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重要发展力量,我国也在积极倡导和建立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这必然会引起美国对维持自己霸权地位的担忧,美国必然会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利用其在西方国家积累的领导力、影响力和巨大资源优势,对中国进行全面“规锁”。国家在经济领域的竞争和合作可以实现互利共赢,而崛起大国与现存全球霸主之间的全面对抗,结局往往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最终以战争或一个国家实现对另一个国家的全面超越而结束。^[4]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尽管我们不愿看到,但中美之间必然会持续对抗,甚至到特定节点,美国会领导和号召其政治同盟,在科技、全球合作等领域与我国实现全面脱钩,对我国实现全面打压,以巩固其霸权地位。^[5]国际环境的另一重大风险——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中与美国的直接或者间接军事战争,是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最直接挑战,一旦军事冲突升级,关系着人类文明甚至地球存亡。

与确定性强和可识别的外部显著威胁相比,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部问题也较为复杂。老龄化和少子化趋势导致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社会负担不断

加重;家庭收入和财产差距过大、富人数量及其财富收入迅速增加,而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偏低、低收入群体规模庞大且绝对收入增加有限^[6-7];产业用地、金融资本等重要生产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同时核心技术和关键产业链环节受制于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产业结构存在较大调整压力;居民消费、民营企业投资内需不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房地产和政府投资;房地产市场下行造成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和地方债务问题值得警惕;新冠疫情影响深远,外部需求降低和内部需求提升迟缓造成我国经济增长乏力。

伴随着新技术、新媒介的创新和应用,我国的经济形态、社会思潮也呈现新发展特点和变化特征,给经济社会管理带来更大挑战。数字经济、网红经济和平台经济的爆发性增长带来税收管理、资本管理、市场反垄断等一系列新课题;去中心化下的自媒体、意见领袖颠覆了传统媒介的信息传播与表达方式,带来了信息泛滥、垃圾信息超载、网络暴力、群体对立、社会道德滑坡等问题,社会公众难以判断信息真伪和信息价值,给经济社会有效运转、青少年正确价值观树立和中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产生重大破坏性力量^[8],社会治理和政策预期管理变得更加困难。

二、新征程中的财政职能与目标选择

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我国财政经历了若干次重大变革,为现代化事业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新征程上,作为国家治理基础的大国财政,承载了更大的经济社会责任和国民期望,要紧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针对新征程面临的重大挑战,科学确立财政职能和政策目标。

(一) 财政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性支撑和保障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开启

了伟大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1949年—1978年),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1978年—2013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2013年至今)。在推进现代化的三个阶段中,财政都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支撑和保障作用。第一阶段,在完成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为适应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和应对国际局势,在经济上,我国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大一统的财政体制和统收统支的国有企业财务制度。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有利于集中力量发展优势部门经济,有力推动了新中国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构建,从而支持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初步发展。第二阶段,我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逐步优化和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为适应经济体制转轨的需要,财政依次经历了包干制、分税制和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等系列改革。通过完善财政体制,有效协调中央和地方利益,合理分配财权事权,中国现代化事业有了重要的动力源泉、资金支持和发展保障。第三阶段,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新时代,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社会的主要矛盾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经济发展也面临重大疫情、不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等各类重大挑战。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支撑产业转型升级、保障社会公共事业、促进共同富裕、统筹安全与发展,成为新时代新征程财政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

(二) 新征程中的现代财政职能

传统的财政观点认为,财政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宏观调控三大职能。无论是国家分配论,还是公共财政论,财政都被视为政府分配资源和调控经济的最重要有形之手。在经济相对平稳运行或

者内外因素相对简单、可识别并相对可控的条件下,通过制定和实施针对性的财政政策,财政职能可以得到有效发挥。然而,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内外部环境较为复杂,除三大职能外,防范和化解重大公共风险,警惕公共风险转化为发展成本,也是我国财政必须要考虑的重点内容。^[9-10]

新征程上,财政资源配置职能要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为人民的目标导向。资源配置既要追求效率,更要重视公平。要调整和优化产业政策、按照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在中央和地方各层面清理各类低效率、数额庞大的财政补贴政策,加快实现财政的法治化和市场化,为全体人民提供均衡优质的公共服务,进一步推动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尤其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地方财政可持续存在重大挑战的情景下,清理不合理、不公平和低效率的产业补贴,集中财政资源、节流改流、优先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维持社会稳定发展,是提升财政效能的重要现实途径。

新征程上,社会主义现代财政要深化改革,优化收入分配机制,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特征。随着经济发展,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群,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11]要深入研究、深化税制改革,初次分配要提升劳动者分配比重、调节资本要素过高不合理报酬;完善个人所得税,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税负,提高超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贡献,探索建立家庭型财税政策;完善税种,提升直接税比重,研究征收资本利得税、房产税、遗产税,并在时机合适时推出实施;二次分配要增强均衡性转移支付水平、加强中央和省级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责任。^[12]

新征程上,财政履行宏观调控、稳定经济被寄予了更多责任,也面临更多困难。面对内外部各类冲击,财政要减税降费、也要增加支出,以保持经济

总量发展稳定、实现充分就业。而增加支出,必然需要增加债务融资,而这也给财政可持续性带来不利影响,进一步加剧地方财政收支矛盾。除了总量目标,财政还要引导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以应对环境压力、资源和要素制约,以及国外技术封锁威胁。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中央将大量的经济稳定职能赋予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由此不断积累了大量的政府债务,财政发挥宏观调控职能时,还要重视监测和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止地方财政危机和金融风险。

新征程开局阶段,全球经济仍深受疫情影响,财政要发挥好对冲公共风险的重要作用。可将应对公共风险,视为财政的重要单独职能,也可将其视为财政履行三大职能的工作重心。当前要重点警惕经济下行导致的房地产市场、地方债务和金融市场可能发生的系统性风险。同时,也要未雨绸缪,坚持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建设强大国防,做好应对一切突发事件的准备。

(三)新征程中的财政政策目标抉择

在上述多重财政职能要求下,财政政策目标的选择要体现科学和智慧,在既定的财政资源约束下,财政政策目标要围绕重要的、迫切的、关乎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的问题来制定、调整和实施,要统筹考虑和处理好远期与近期、整体与局部、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财政政策近期的重要目标是有效支持内需以促进经济复苏。在当前国内外复杂政治经济环境下,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紧要问题是要改变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尽快提升经济复苏动力,积极引导居民消费、促进企业投资、提升社会对经济发展的预期,通过经济增长来化解家庭、企业和政府部门潜在债务风险。在疫情防控政策重大调整背景下,要立足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向好发展的信心决心,提升中央政府和部分发达

地区地方债务融资的规模上限,增加政府有效投资以保证和扩大内需,扭转我国经济下行趋势。财政有效支持内需提升,一方面是主动增加政府投资,另一方面是助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对于政府投资而言,关键是提高政府投资效率,提升单位投资的GDP产出贡献。政府投资应围绕传统基建补短板和新基建助力数字经济发展进行,避免低效率重复投资。提升居民消费需求,一方面要完善和优化个人所得税,降低中低收入家庭税负,增加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要完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机制,提升整体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13]

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是财政政策运用的长期经济目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提升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关键是持续优化我国的经济结构,加快传统动能向新动能转化,将经济增长由数量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基本要求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开发利用新能源、提升传统能源利用效率和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政府用于引导鼓励企业创新发展、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和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的产业政策大部分要通过制定和出台一系列财政税收政策来推动和实现。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是财政运行和政策实施的长期社会目标。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经过70多年的艰苦奋斗和努力耕耘,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已经得到很大提高,我国GDP已突破120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财富蛋糕总体体量已经

足够大。如何更好地分配蛋糕,使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体劳动人民,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财政活动体现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14]在物质财富已经得到充分积累、生产力足够发达的现实情况下,通过完善分配制度、优化政策工具,来降低贫富差距,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财政的天然职责。

三、新征程中的财政政策体系构建与效能提升

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职能的有效发挥和政策目标的成功实现依赖于构建更加完善的现代财政政策体系以及全面提升财政政策实施效能,即要持续推进财政政策提质增效,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一)构建更加完善财政政策体系

财政政策体系是指财政政策诸要素、各环节的有秩序集合体,具有系统的整体性、相关性、目的性、层次性、动态性和环境适应性等特征。财政政策体系是系列财政政策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既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来保障其运转效率,也要随着财政职能和政策目标的重心变化而动态调整。从当前我国财政政策体系的建设现状和作用发挥来看,完善现代财政政策体系至少应包括优化和建立更加公平高效的财政支出政策、财政税收政策、债务融资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

新征程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资源合理配置,需要更加强有力有效的财政支出政策。当前,我国财政支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支出结构不合理,存在大量的无效或低效支出,以及扭曲资源配置、违背公平市场竞争原则的各类政府补贴。前者主要指地方政府在政府投资制度不完善、科学决策体制欠缺的情况下,将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本不

必要的建设项目上。后者则主要指地方政府不规范利用财政资源支配权,为吸引企业来本地投资或贯彻地区所谓的产业政策而制定和实施的对企业名目繁多的各类非市场化补贴政策。非市场化、歧视性的各类政府补贴造成了企业间不公平竞争、国内市场分割,也容易引发国际贸易争端。在过去三年的疫情防控期间,已经显示出我国公共卫生设施和防护体系、分级医疗体系、医疗物资储备资源等应急机制建设薄弱等问题。而且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仍旧有大量的财政资金被发放在疫情中明显受益或者盈利能力更强的企业。因此,需要从两个方面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一是要进一步增加政府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加强财政支出活动的预算约束、使用监督和绩效评估,强化对低效无效项目支出的问责机制。二要增强政府各类补贴的透明度,消除各种不利于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有损公平和效率,甚至滋生寻租等腐败行为的产业政策。2018年以来,为应对中美贸易冲突、落实中美经贸谈判,我国自上而下对地方产业政策开展过集中清理行动。当前,应趁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契机,进一步清理仍旧存在的低效产业政策。^[15]

新征程上,保持财政运行可持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要构建更加合理完备的税收政策体系。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了绝对贫困,但随着经济发展,不同群体收入不均等的“相对贫困”仍未从根本上缓解,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复杂问题。招商银行2022年年报显示,0.07%的富人阶层持有31.28%的资产,2.18%的中产阶级持有50.10%的资产,而97.75%的普通大众仅持有18.62%的金融资产。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使改革开放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须围绕建设更加平等的社会阶层结构来完善税收政策。要健全直接税体系,逐步提升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贡献;要深

入贯彻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探索如何将减税降费等阶段性政策常态化、制度化,改革优化间接税和企业所得税制度,降低中小企业税收负担,加强对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管理。

新征程上,保持经济系统稳定,防范重大金融风险,需要持续完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政策。地方政府债务在提供地方公共品、稳投资、稳就业、稳增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近三年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地方政府专项债充分发挥了投资拉动作用,促进和保持了经济稳定发展。但与此同时,我国也不断累积规模巨大的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这只“灰犀牛”,既可以通过政府间纵向传导演化为中央财政风险,也可以通过各类型债务融资衍生为金融风险。后疫情时代,加强地方债务风险治理,已成为提升我国财政治理能力、防范化解经济领域重大风险的重要命题。要构建法治化的政府债务融资决策流程、债务融资规模的财政规则,以及公开的债务信息披露制度,为金融市场建立充分透明的债务风险评估基础;要创新政府债务融资工具,加快推进地方债券置换隐性负债,探索市政债发行机制,退出银行贷款等不透明融资渠道;进一步推动融资平台企业市场化、实体化转型,明确融资平台企业的职能责任和政企边界^[16];建立政府债务重整和融资平台破产制度,建立金融机构违规发放政府贷款的责任追究制度,强化金融机构的市场约束责任,以市场化原则遴选政府投资项目,增强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新征程上,尤其是接下来五年开局阶段,经济发展仍旧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经济增长波动幅度可能较以往大大提高,要持续探索和完善宏观调控政策,发挥好财政的自动稳定器和相机决策功能。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来自于中央政治集权下的地方政府间竞争,地方政府在中央的统一领导

下,承担了大量的财政事权支出职责以及很大部分的经济稳定职能。^[7]我国财政分权体制在促进经济增长、应对经济下行、对冲经济风险过程中,体现出了决策快、执行快、见效快等明显的制度优势,但也伴随着粗放发展、资源浪费、效益不高等问题。而且,将经济稳定职能大量赋予地方政府,会导致地方债务规模大量扩张,从而引发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威胁地方财政可持续性运行。随着我国经济体量不断提高,劳动力、资本、资源等要素优势逐步减少或消失,必然要求提升财政调控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精细化和精准性。要改变传统的单一依赖基建项目建设和主要依赖地方投资的经济调控政策,建立包括减税、增加政府转移支付等扩大居民消费和提高企业投资需求的综合性财政政策,将宏观调控职责逐步向中央政府进行集中。要丰富和完善财政政策工具包,提高财政政策的精准性,减少财政政策运行各环节的堵点、断点和障碍。要界定好地方政府财政事权,确保地方政府在逆周期调控时财政支出能够不偏离公共财政的职能目标,确保地方政府投资的科学性和良好经济社会效益。

(二)全面提升财政政策实施效能

财政政策实施效能是指财政政策职能发挥的效率、效益和能级,反映了财政政策目标选择的合理性和所实现的程度。全面提升财政政策实施效能,是财政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标志。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政府性基金收入计算,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接近30%,财政收支在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中处于重要地位。如此巨大规模体量的财政收支,意味着财政政策实施效能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社会公平、经济可持续发展等目标的实现程度,关系着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速度和质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财政政策实施效能也是充分发挥财政

政策乘数效应、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方面。

全面提升财政政策实施效能,要强化遵循和应用法治化和市场化两大基本原则。一方面,要继续加强法治财政建设,尤其是规范和完善地方财源税种,明确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权责,提升财政收入和支出质量,稳定经济社会发展预期,更好发挥法治财政在推动民主社会建设和保障公民合法权利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是基于人民公共需求所建立和运行的,国家分配的根本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公平正义、社会平等,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功能目标和价值追求。法治财政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功能发挥提供根本保障。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市场取向改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不断提升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既要遵循公平原则,解决市场机制失灵导致的公共品供给不足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也要遵循效益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以市场效率原则合理安排财政各类支出,优化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以最小的公共支出实现最大的社会福利。

全面提升财政政策实施效能,要注重财政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协调增益。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坚持系统观念”作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遵循的五项原则之一,党的二十大再次要求“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宏观经济政策间的协调,是系统观念在财政政策领域的重要体现。百年大变局下,国际政治秩序变革、逆全球化思潮、技术进步与创新、全球变暖、地缘冲突和战争等多重变量相互叠加,相互交织,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正经受多重压力和危险因素的考验。高水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集合集体智慧,形成一个系统性强、覆盖面广、作用功能能够有序强健输出的经济政策体系。新征程上,经济财政政策的运用兼具对冲风险、保增长、调结构、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等多重作用,尤其是在当前国内外复杂经济形势下,财税政策既要扩内需、保外需,保运转、稳就业,还要注重产业结构调整,这必然要求要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有效结合起来,政策之间加强协调配合,发挥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作用。

全面提升财政政策实施效能,要加强财政税收政策与主要经济体国家政策的协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中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的产业活动密切相关。中国经济的繁荣稳定离不开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各国之间的密切经贸合作。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财政税收政策更要注重国际协调。通过国际协调合作,保证我国经济发展身处一个有利的外围环境。坚持大国自信,履行大国责任,积极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和贸易伙伴协调,尽量保持财政政策的同步。遵守国际经济活动惯例和商业规则,避免由于单方面出台财政政策引致贸易纠纷。要保持对世界经济走势的关注,及时跟踪他国财政政策的变动和调整内容;善于学习,跟上时代步伐,重点在税收领域加强国际合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税收合作不仅指涉及贸易公平的商品增值税、关税等传统税收问题,也包括数字经济发展大趋势下,国际税收征管合作,防止企业利用不同国家税制差异进行资金转移和逃避税,促进税收在主权国家之间更加公平合理地分配,推动社会平等和实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 [1] 李毅. 立足两个大局 心怀“国之大者”[N]. 人民日报, 2021-06-04(13).
- [2] 刘尚希,傅志华,李成威等.全面认识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问题的重要论述[J].财贸经济,2022,43(2):5-17.
- [3] 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J].国际经济评论,2019(5):9-19.
- [4] Allison G.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 [5] 钟飞腾.在技术制胜与中产稳定之间:美对华经济“脱钩”前景[J].当代美国评论,2022,6(1):57-78.
- [6] 李实.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J].经济研究,2021,56(11):4-13.
- [7] 徐飞.共同富裕的理念演进、实践推动与基础性制度安排[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22):96-104.
- [8] 彭波,张权.中国互联网治理模式的形成及嬗变(1994-2019)[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27(8):44-65.
- [9] 刘尚希.防范化解公共风险 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N].光明日报,2020-10-04(7).
- [10] 刘尚希,赵福昌,孙维.中国财政体制:探索与展望[J].经济研究,2022,57(7):12-25.
- [11] 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21世纪资本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12] 杨灿明.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应重点把握七大关系[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3,256(1):3-9.
- [13] 刘昊,陈工.财政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功能定位及支持举措[J].地方财政研究,2020(11):4-9.
- [14] 龚浩.国家治理视角下中国财政理论的嬗变(1949-2018)[J].上海经济研究,2021(8):38-47.
- [15] 刘志彪.国内统一大市场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11-26(5).
- [16] 刘昊.基层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及市场化转型——以W市H区为例[J].地方财政研究,2021(3):24-34.
- [17] 刘昊,陈工.制度安排与变迁下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形成机制——基于博弈分析的一个完整框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9,35(12):3-15.

【责任编辑 孟宪民】